

重点
阅读

清史专家卜键近日推出了70余万字的新著《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在没有读此书前,我只知道王鼎是今陕西蒲城人,在蒲城县的一条街上有一个牌楼,上面写着“将相故里”,“将”指的是杨虎城将军,而“相”则指王鼎。王鼎在鸦片战争期间支持林则徐,主张禁烟,反对英国侵略者。如此而已,其他我一无所知。

今年“五一”前我收到《国之大臣》一书。先看引言《军机处别院》,再看跋《请记住这个名字》,才知道王鼎是科举出身、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官至清朝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中枢大臣。我用三天时间看完全书,才知道作者卜键在此书跋中所说“本书不能说是——本单纯的王鼎传记,笔者所力图呈现的,还有两朝中枢的政治运作,也有与王鼎同时的一些大臣”,确实如此。《国之大臣》一书,实际是清代嘉、道两朝的政治史、边疆史、军事史、河工史、海防史、文化史的综合,远远超过了王鼎一人传记的范围。从此书的广度和深度可以看出,作者卜键具有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的全面深厚素养,否则是写不出这样的著作的。

《国之大臣》一书内容厚重,言之有据,没有半句空话,是一本扎扎实实写清代历史人物及其政治环境的学术著作,可以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二者的辩证统一。其中对于王鼎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从海疆到边疆,从禁烟到销烟,从天灾到人祸,从口门(黄河水冲决的缺口)到国门,方方面面,写了王鼎一生的经历,由此展现出清代嘉、道两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最后,王鼎用“尸谏”的办法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从时代来看,由此开始,清代由盛转衰,后来不断滑坡,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在这本

■新知新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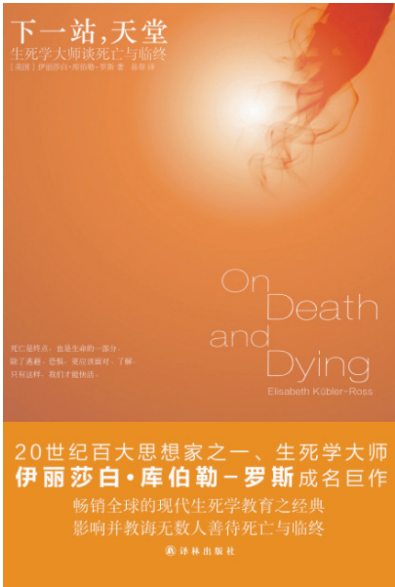
近日,读了王维亚系列散文“古长安碑刻说三部曲”,令人眼睛一亮、精神一震。全书闪现出诸多璀璨夺目的亮点,毫无疑问,若无对书法碑刻有极深的造诣和相当的研究,是很难抒写出如此洋洋大观之作的。

何谓散文?说话就是散文。“手则握笔,口却登场。”怎么说就怎么写,这就是古代文章大家的经验之谈。王维亚的书法碑刻散文,跳出了“三段式”创作樊篱,用自己多年对书法研习的“自得”之见,挥毫时的“自由”之笔,酷爱书法的“自然”之情,以及临摹创作中萌生的“自在”之趣,一一彰显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之中,这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创新。他终于还散文创作的自由、自由与自在真面目了。读王维亚的散文,好像听他聊天一样,一会儿秦岭南北,一会儿古城西安,处处不离书法碑刻,句句浸透着他对于书法的独钟之情,字里行间蕴含着浓重的书卷气,昭示着作者的学者风范。他描写时一没作势,二没摆架子,完全以一个平常人平等的态度和平静的心去诉说,面对如许珍贵的书法碑刻,他像在心里说自家的事,或像对自己说人家的事情一样亲切、平淡、自然。虽然看似说话拉家常,其实内藏着作者的真功夫,正如日本学者厨川白村所说的那样,“装着随便涂鸦的模样,其实都是用心雕心的刻骨的苦心文章”。

散文如水,贵在自由散漫。王维亚的这三部散文集正像涨潮的钱塘江一样,乍看无什么章法,但却真正突显了水的特性:滔滔汨汨,无间无际,绵长贯通;性上自然,随物赋形,自然贴切;顺势而泻,波澜起伏,委婉磅礴。散文姓“散”,贵在自由,散文的自由应

像斗室闲聊一样,娓娓缓谈,徐徐道来,张嘴尽是白话,但却白中露色、俗中见雅。王维亚看重口语,并在造句艺术上追求更高境界的不懈努力。“南来北往的风仍在/这山中的条条古道穿行”;“在紧要处前举又推了他一把”;“我想把一座小城/一座小城里的文化宝库/搬到你的面前”;“隶书渐行渐远中/唐楷已在微笑着招手了”……从这些看似不经意实则煞费苦心提炼的标题中,可以看出作者深悟“话须通俗方传远”的道理,也颇具现代诗人的气质。这三部紧紧围绕书法碑刻的散文集,取材天地人间,宇宙人生,无所不包,散得开阔;结构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散得别致;笔法色彩斑斓,格调统一,散得有度。这一切无不显示了作者的自由之心、自由之意和自由之笔。这三部散文集就是他钟情、苦恋、研习书法多年,从心底唱出的歌,从胸中写出的话。

纵观中国历史,作家的学者化可谓一以贯之。诸子百家中哪一位不是学者?唐宋散文八大家又有哪一位不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鲁迅、朱自清等不也都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吗?作家——旦学者化,他就会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把知识和真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一个学者化的作家,会依靠知识和真理标准,仅用嘴巴和笔杆向社会开口,不会说些违心或者言不由衷的言论;会甘于寂寞清贫,一门心思做自己的学问,不会凑热闹、赶潮流;会在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中,始终与生活、历史及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紧张感和思想张力,不断将自己的问题和创作方法历史化、相对化。解读王维亚,似乎



展现清史的真实与丰富

□张岂之



书里把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得这么巧妙,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非常难得的。

同时,历史著作应该给读者以具体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只有框架或者只停留在若干理论、名词的表述上是不够的,感人的力量就没有了。卜键的《国之大臣》给了我们许多关于清史的具体知识。例如该书第九章,叙述了清代新疆南部的政治情况以及道光时期发生在新疆南部的大暴乱,如果这次大暴乱不平息下去,那么祖国的统一就会受到影响。又如其中第三节“举国之力反击”,选择出一

些典型史料,我们看这些典型的资料,就可以了解什么叫阿克苏保卫战,具体而微,清清楚楚。再如第十章,盐政和边政,都是清代专门性很强的问题。什么是盐政?什么是边政?老实讲盐政的起源不是在清代,早在汉代《盐铁论》中就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盐政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焦点问题。盐政和边政在这本书里都有比较具体的介绍,使读者有了这方面的具体知识。

当然,一本书把所有历史上相关时期的问题全部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有一些问题提出来,作者也不需要解决,而是可以让同行们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解决。卜键的“跋”《请记住这个名字》写得很好,其中有一段话:“阅读王鼎,认知王鼎,描写记述王鼎,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是对儒家思想精义的领悟。人民为什么赞颂屈原?正在于他对国家命运的焦灼忧惧,在于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在于其殉国、殉道的死之绚烂。王鼎就是清代的屈原!”这样的比喻无可厚非。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到,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正面人物或者对历史作出这样贡献和那样奉献的君子,大都受过儒学的影响。孔子宣传“谋道不谋食”,把人关于家国和自身的理想提高到很高位置,给人以精神的动力,其功不可没。“谋道不谋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今天宣传、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价值观,用一句话来表述就叫“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生活的目的不在于得钱有多少,关键是道,道就是理想,就是价值。

通过王鼎还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从隋唐

开始实行科举制。隋朝的时间很短,到唐朝才开始正式实行科举制,使读书人通过这条路走向皇权统治下的重要岗位,有些官员既有很高的道德操守,同时对国家做出了很大奉献,被记述在历史中。就我个人体会,科举制的宗旨是择优,在众多的读书人里面选拔出最优秀的。其重要的功能在于防劣,防止行为操守不好又没有学问的人考取,进入政界。有操守、有学问的人可能考中,但操守和智力有问题的人往往很难通过考试入围,这也许就是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科举制,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设想,王鼎可能一生在陕西省的蒲城度过,在耕读二者中度过一生,没有机缘参与国之大事,当然成不了国之大臣。成不了国之大臣,200多年以后的卜键也就没有办法来写出这本书了。这又是我的推想。作者在书中讲,王鼎的弟弟老是考不中,他也是读书人,怎么回事呢?这虽然不是主题,但作者也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科举,考的是笨功夫和死功夫,是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也是以儒学浸润濡染的人生态度。”他的弟弟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我认为这是很实在的评论。

此外,《国之大臣》一书似乎有些拘谨:有些地方该作理论归纳,还是可以写下寥寥数字,似乎不宜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多回避。“画龙点睛”与“泛泛之谈”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可因避免空话而忽视必要的“点睛”。

希望史学界和对文史有兴趣的朋友们都能读一读这本书。

《(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卜键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能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上述特质。在他的三部散文集中,看不到架空议论和抒情,看不到抽象的概念推演和宏大的理论预设,他常常是在综合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直逼对象的问题所在,且言简意赅,起到了“居要”和“警策”的作用。如《从石门到九成宫》中“一个人是不可能把美写尽的”一节结尾写道:“唉,一个人是不可能把美写尽的。做艺术同人生的其他方面一样,要知不足,也要知足啊!”在《悟对西安碑林》中,作者讲的是西安碑林,开篇小标题是“我们从来都是应该认为/她是无比珍贵的”,全文收官之笔,作者无限赞叹地写道:“纵观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书家们,无不是倾其全部的心智,倾其一生的努力来深深热爱着书法艺术的。他们写尽百家,不断地调整自己,一丝不苟地审视自己的艺术态度,不停地展现着自己的艺术才华,他们追求着变化着,用笔墨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也完成了一个艺术上的大我。”这既是对西安碑林书法大师们的讴歌,又何尝不是作者的自况,或者说作者是为自己预设的终身奋斗的目标呢?

统观王维亚这三部散文集,无疑是作者多年研习秦代历史上碑刻和书法大师的成果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从众多碑刻和书法瑰宝进入历史的某种姿态或方式,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在解读这些碑刻书法时的某种思想穿透力,更能领略到作者所具备的带有某种学者色彩的人文情怀。

《(镌刻石头)》《悟对西安碑林》《从石门到九成宫》,王维亚著,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关于死亡之惧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深爱的家中,在这片他居住过、热爱过的土地上,他被鲜花环绕,周围聚满了友人与乡邻,他们都来见他最后一面。

为何我要描述这些“老式”的习俗呢?因为我觉得它们折射出人对死亡的接纳,让临终病人得到安慰,帮助其家人接受挚爱终将离开的现实。如果病人被允许在爱意满满的家中走完生命的全程,他就无需做出过多的调整,以适应其他环境。

许多患过重病、需要休息、渴望安慰的人,大概都有过躺在担架上,忍受着救护车发出呜呜的噪声,以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医院的不适

感。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在层层被单和毯子下,病人的内心感受。现在最好停下那些所谓善意的、有效的、东奔西走的行为,尝试去握住病人的手,微笑着聆听他的疑惑。

有人会问:我们是变得越来越缺乏人性,还是越来越富有人文关怀?尽管本书无意作出判断,可无论答案是什么,显而易见,如今病人们遭受的折磨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时代更迭,而病人的需要从未改变,改变的不过是满足需要的能力。

《(下一站,天堂),[美国]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著,易非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叶辛是一位社会影响力很大的知青作家,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知青生活与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就总体状况而言,虽然叶辛小说写作的数量很大,但从题材上看,基本上还是拘囿于知青生活领域的居多。近些年来,或许与作家已然身居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多年,大都市的生活积累日渐丰富有关,叶辛也在努力地突破既定知青题材领域的桎限,尝试着拓展新的写作领域。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很显然就是一部他试图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的作品。虽然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大上海,但作家的艺术聚焦点却集中到了打工者的身上。

打工,是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放眼文学界,有不少作家不仅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也已经写出了不少以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但叶辛这部《问世间情》的特别处在于,他并没有试图全景式地展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而只是紧紧地抓住了打工者群体中间一种极为普遍的“临时夫妻”现象,以之为具体切入点,力求从一个侧面表现打工者的情感世界。所谓“临时夫妻”,就是指打工者无论男女,往往会是或者抛妻(夫)别子或者各异地单独一人在外地打工,因为打工者一般都处于青壮年阶段,既有难以遏制的性需求,更有着强烈的情感慰藉的需求。怎么办呢?既然大家都是单身一人在外,那干脆就合住在一起临时搭伙过日子算了。这一搭伙的结果,自然就是所谓“临时夫妻”的出现。“临时夫妻”这种现象,既不合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更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惟其因为它顺应合乎人性的根本逻辑,所以这种现象在打工者阶层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就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既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那就不应该得到来自于生活各方面的充分关注,也应该在作家的笔端得到相应的艺术表现。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虽然关注表现“临时夫妻”现象的中短篇小说时有所见,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具备相当深度的艺术表现,却还真是极其罕见,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占据着《问世间情》这一小说文本中心位置的一对“临时夫妻”是索远和麻丽。只是一味沉浸在如此一种幸福生活氛围环绕中的二人根本就无法料想到,他们这种顺风顺水的“临时夫妻”生活的平静只不过仅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就会因为索远妻子但平平与女儿索想没有任何前兆的突然到来而被彻底打破。由于家乡郑村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巨大洪灾,不仅无情地吞噬了村民们赖以栖身的房屋,而且还吞噬了几十条鲜活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索远年迈体弱的父母。房屋没了,公婆走了,孤身一人的但平平只能够带着幼女不顾千里迢迢前去投奔远在遥远的大上海打工的丈夫索远。因为事先没有通气,所以,她们母女俩的突然现身才会让索远倍感措手不及。

可以说,《问世间情》最具人性深度处,也正体现在作者对于男主主人公索远面对着但平平与麻丽实在左右为难、无法作出取舍的内心纠结状态的精准呈现上。叶辛是一位特别擅长于感情渲染的作家,他对于索远情感纠结浓墨重彩式的艺术表现,的确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或许正与叶辛的善于感情渲染有关,他居然把自己这部旨在透视表现打工者群体中“临时夫妻”现象的长篇小说,干脆就命名为“问世间情”。一看到这个题目,相信很多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千古名句来。而叶辛的命名动机,很显然也正在于此。

不过,作家在艺术想象过程中存在着情理失衡现象。这里所谓的“情理失衡”,与艺术想象中感性 with 理性所发生的作用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过程。具体来说,感性因素,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作家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里,叶辛对于索远与麻丽这对“临时夫妻”之间复杂情感纠结的表现,尤其是对于索远情感矛盾的精准捕捉与呈示,都可以说是他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感性因素重要的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忽视作家的艺术理性在创作过程中所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成熟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皆是创作主体艺术感觉与艺术理性有机结合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假若说叶辛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中有着较为精彩的表现,那么,其艺术理性的表现恐怕就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了。这种艺术理性表现的不足,既体现在若干故事情节设定的说服力不够充分,又涉及关于所谓“新上海人”文化想象的合理与可能性问题。在作者的理解中,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大上海的打工者,已经到了能够落足上海,融入上海,并且实现身份转换,成为“新上海人”的地步了。很显然,正是在如此一种在我看来充满浪漫化色彩的文化想象理念的支撑下,《问世间情》中所活跃的打工者,基本上全都是“新上海人”的形象。这里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宽容接纳姿态,仿佛在这个过程中,就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文化与地缘冲突一样。在我的理解中,广大打工者由乡村进入城市,这一过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同叶辛所描写展示的这样顺利、和谐。这是一种充满着痛苦的社会裂变过程,无可避免地会有诸多人生与人性的悲剧生成。但遗憾之处在于,所有的这一切,在《问世间情》中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表现。除了麻丽之死这样一出带有很大偶然性的他杀事件之外,弥漫于整部小说文本之中的,都是一种对于“新上海人”充满着浪漫化色彩的乐观主义文化想象。似乎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这样看来,可后后的小说写作过程中,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艺术理性能力,以实现艺术想象中的情理平衡,就是作者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问世间情),叶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艺术想象中的情理平衡

□王春林